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博士科研文献学术水平认定申请表

博士生姓名: 张彩云	学院: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专业: 世界经济
学号: 201701150126	导师: 桑百川	字数: 2.47 万字
文献题目: 利用外资对国内大循环作用的文献研究		
文献摘要及与学位论文的相关度描述: (500 字以内)		
<p>文献摘要: 外资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载体, 其形成的外资经济既参与国内循环, 也参与国际循环。尽管中国利用外资规模逐步扩大, 但外资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和贡献却在逐步下降。围绕着新发展格局下还要不要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 外资还能不能发挥重要作用等问题, 在学术层面还有一定的争论。为深入剖析外资对国内经济循环的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式, 着重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相关研究、对外资争论作用和贡献的相关研究、外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以及文献评述等方面展开分析。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现有研究对于国内大循环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认识, 对于外资与国内大循环之间的关系,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都不够充分, 还需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探讨。</p> <p>相关度: 本文研究与学位论文相关度极高, 即两者研究主题一致, 且本文研究是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组成部分 (即文献综述)。</p>		
三位同行专家认定意见		
<p>该文献研究外资对国内大循环的作用机制, 选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作者归纳了国内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利用外资的争论、外资的作用、外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等相关的研究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作者。文献掌握较为全面, 知识运用较为准确, 叙述结构合理, 层次分明, 逻辑性强, 文字通顺流畅, 体现了较扎实的理论基础。</p> <p>总体来看, 张彩云同学的文献符合博士学术规范, 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已达到学术论文的发表标准, 建议进行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折算。</p>		
<p>同行专家签字: 李广 李梅 郭桂霞</p> <p>签字日期: 2022.5.11</p>		
导师认定意见		
<p>经本人及同行专家鉴定, 该科研文献已达到学术水平认定标准, 建议进行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折算。</p> <p>导师签字: [Signature]</p> <p>签字日期: 2022.5.16</p>		
培养单位审核意见		
<p>同意 [Signature]</p> <p>主管院领导签字: [Signature]</p> <p>签字日期: 2022.5.19</p>		

# 利用外资对国内大循环作用的文献研究

**摘要：**外资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载体，其形成的外资经济既参与国内循环，也参与国际循环。尽管中国利用外资规模逐步扩大，但外资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和贡献却在逐步下降。围绕着新发展格局下还要不要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外资还能不能发挥重要作用等问题，在学术层面还有一定的争论。为深入剖析外资对国内经济循环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式，着重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相关研究、对外资争论作用和贡献的相关研究、外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以及文献评述等方面展开分析。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对于国内大循环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对于外资与国内大循环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都不够充分，还需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探讨。

**关键词：**外商投资；国内大循环；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缺口理论

## 一、新发展格局的相关研究

2020 年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之作为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理论指导和战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当前学术界围绕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概念特征、价值意义、形成基础、辩证关系及相应的构建措施等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一）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着眼于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在理论上以新的内容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张永亮，2020；任君和黄明理，2021）。目前，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角度阐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它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张任远，2020；高惺惟，2021；周小亮，2021）、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高惺惟，2021；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张永亮，2020）、

剩余价值理论（裴长洪和刘洪愧，2021）、世界市场理论（柳思维等，2021）、空间生产理论（胡博成和朱忆天，202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张永亮，2020）等理论，学者们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运用到了对新时代和世界变局的分析当中（逢锦聚，2020）。

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看，一些学者沿用亚当斯密经济学范式，用大国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了双循环的大国规模经济效应。发现由众多人口形成的超大市场规模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这是因为超大市场容量带来劳动分工细化、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以及产业竞争力提升（荣晨，2018）。大国经济的规模性不仅表现在人口众多以及幅员辽阔方面，也表现在资源丰富和市场需求大等方面，由规模经济带动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并由此获得竞争优势已成为定律（Alfred Marshall, 1890）。李震（2021）研究表明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和多元性等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研究认为，我国依托超大规模的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经济形成了叠加耦合效应，构成了经济的超大规模性。

从国际贸易理论看，有学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经济在与国际经济相衔接过程中，基于比较优势相互竞争、相互依存（刘元春，2020）。有学者基于“技术差距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虽然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往往最先在发达国家问世，但若要进入国际市场，须先在国内获得广泛市场，国际市场以国内市场的开拓为前提（丁平和张二震，2013）。有学者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循环水平的重大意义（张建华和刘仁军，2004；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

以上理论共同表明，国内需求、本土供给与对外贸易密不可分，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和前提，只有畅通国内大循环，牢牢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从而把对外贸易内嵌于国内市场，才能实现双循环的良性互动（钱学锋，裴婷，2020）。

## （二）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背景

学界普遍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具有自然性和必然性（任君和黄明理，2020；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江小涓等，2021），中美关系复杂且多变、多变经贸合作相对停滞不前（余淼杰，2020；陈佳，2020，李猛，2020；余淼杰，2020；张明，2020）；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Donald 等，2019），发达国家主导制造业回流（Acemoglu& Restrepo，2019），中国产业链供

应链的安全和地位受到极大挑战（黄群慧，2021；赵英臣 2020；余淼杰，2020）；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和蔓延，强化了贸易体系碎片化和区域化（高伟，陶柯，2021；陈佳，2020；王钰鑫和王耀鸿，2021；王在全，2020；丁一凡，2020；李猛，2020；徐奇渊，2020）。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进入发展新时期，一是要素禀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进入明显递减区间（郭晴，2020；王晋斌和厉妍彤，2021）。二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前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境流动规模已经居世界前列（江小涓等，2021），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内需潜力旺盛，新领域投资增长空间大（徐奇渊，2020；彭小兵和韦冬萍，2020；陈文玲，2020；黄群慧，2021）；我们拥有门类齐全的产业链和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余淼杰，2020；张明，2020）。可以说，当前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 40 年有已经有很大不同（江小涓等，2021）。

### （三）“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概念界定

学术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认识和理解。有学者认为国内循环就是“内需”，国际循环就是“外需”（徐奇渊，2020），有学者认为国内循环是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国际循环是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江小娟和孟丽君，2018；汤铎铎等，2020），有学者认为，国内大循环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国际大循环是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刘元春，2020）。还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完全依赖国内要素、在国内生产、在国内消费的纯内部经济循环（王晋斌和厉妍彤，2021），各个国家间只是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有所差异（张彩云和马宇，2021）。有学者认为，不管程度如何，各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出发点都是以外促内，推动国内经济发展（黄群慧，2020）。中央也多次强调，“双循环”中的“内循环”是“开放的循环”，因此，判断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的侧重点，不应该看生产要素来源（张彩云和马宇，2021）。

学者们普遍认为，即使概念上能够界定，但是对参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程度的数量上的界定却是很有难度的。黄群慧（2021）尝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将一国的 GDP 分解为纯国内生产、传统最终品贸易生产、简单中间品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和复杂中间品全球价值链生产四个部分，通过计算各部分增加值占

GDP 的比值，来衡量国家国内经济循环和对国际经济循环的依赖程度。

#### （四）“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辩证关系

关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一些学者主张两者有主次之分。有人认为新发展格局的新意主要是体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体（贾康，2021）。认为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深度融合越来越艰难，在这种情势下，两个循环的脱钩或将成为主要发展趋势。有人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以扩大内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是排斥、弱化甚至否定国际循环，而是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从“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转变为“国内循环推动国际循环”以更高水平和层次参与国际循环（钱学锋和裴婷，2021；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张永亮，2020；高伟和陶柯，2021；陈佳，2020；蒲清平，杨聪林，2020；高惺惟，2021）。另一些学者主张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认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不是探讨两者的主次之分，而是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朱民和郑重阳，2021；李震等，2021）。国内循环是实现国际循环的前提、基础和保障，国际循环是实现国内循环的支撑、外延和补充（钱学锋和裴婷，2021；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王晖，2020；张永亮，2020；高伟和陶柯，2021；陈佳，2020）。

很多学者研究证明，从数量上我国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向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转变越来越明显，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杨英杰，2020），我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峰值64%降低到2019年的32%左右（黄群慧2021）。同时也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非是简单的数量上的主次关系。而是战略上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和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杨伟民，2021；黄群慧2021）。也就是说，我国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要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以国内分工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推动国际分工和国际技术创新的发展（邹菊芳，2020），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供给质量，通过挖掘内需潜力，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加大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进入，以内部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对外开放创造更好的前提条件，以“外循环”的高水平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完善和发展，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黄群慧2020；刘元春，2020；李晓，2021），由此可见，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双循环相互促进”（李计广，2020）。

### （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和措施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畅通国内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两个方面展开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

在畅通国内循环方面，有学者从供给侧出发，一是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使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完整（高惺惟，2021）；二是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调整投资结构，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稳步扩大有效投资（马晓河，2020；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有学者从需求侧出发点，提出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包括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消费体系，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黄群慧 2021；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有学者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各个环节出发，研究如何通过打通堵点推动形成双循环。在生产环节，学术界主要从加强科技自主创新、提升产业创新能力（钱学锋和裴婷，2021；王在全，2020；余淼杰，2020；赵英臣，2020），以及推动产业链升级，维护产业链价值链安全，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丁一凡，2020；李猛，2021；徐奇渊 2020；任君和黄明理，2021）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流通环节，主要从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钱学锋和裴婷，2021；张永亮，2020；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余淼杰，2020；赵英臣，2020；李贤，崔博俊，2020；依绍华，2021），提高流通环节的现代化程度（黄群慧 2021）、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分配环节，学者们主要从稳定就业、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民生保障标准入手，提升分配高效公平，在消费环节，主要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等入手研究如何提升消费能力（黄群慧 2021），从提高民生保障标准入手研究如何增加消费意愿，还有学者从促进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完善消费环境，创新消费方式等方面展开讨论（高惺惟，2021）。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对外开放方面进行了思考。有学者从“以内引外，引外强内”角度出发，提出以畅通国内循环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以更加壮大和完善的国内市场，吸引更多的高技术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服务于中国经济，提升中国产业链水平（裴长洪和刘洪槐，2021；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有学者从研究内外需关系入手，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作用在于，推动内需和外需之间从替代关系更多走向互补关系（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有学者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出发，提出对外开放要走向更深层次，加强国内国际标准对接，构建适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制度体系（江小涓，2021）。

## 二、利用外资的有关争论

### （一）改革开放以后围绕外资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是否应该引进外资的争论不曾间断，大约每隔 7、8 年就会发生一次（桑百川，2005）。当前面临新的形势和格局，关于是否继续利用外资的争论再次上演。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围绕着中国是否应该利用外资，展开了激烈争论；1988 年前后，围绕着利用外资是否扰乱了经济秩序、外资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等问题，展开了新的争论。1995 年前后，围绕着外商投资是否威胁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垄断了中国市场、挤垮了民族经济和民族品牌等问题，掀起了新一轮大规模争论（张问敏等，1997；张宗斌，1999；桑百川，2005；张宇，2008）。

2004 年前后，争论集中在中国利用外资是否过多（陈默，2004；桑百川，2005），中国是否还应该积极利用外资；外商投资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陈默，2004；陈飞翔等，2004）；外商投资是否威胁了国家经济安全；外商投资是否垄断了中国市场；利用外资是否存在“拉美化”危险（任慧玲，2004）；外商投资是否瓦解了自主创新体系（马天毅，2006；侯润秀，2006）；外商投资是否挤垮了民族经济；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是否必要等方面<sup>1</sup>。

2012 年前后，中国利用外资进入调整期，争论围绕利用外资是否阻碍了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刘志彪，2015），是否制约了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李玉梅和桑百川，2010；牛泽东，2011；胡静寅等，2011；谢兴龙和陈英，2011；梁云，2015），是否加剧了环境污染，中国是否还需要加工型外资（隆国强，2012；裴长洪，2013；张二震，2014；林毅夫，2015；桑百川和张彩云，2016）等方面展开。

### （二）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后围绕外资的争论

2020 年前后，党中央适时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发展格局。肯定了创新的核心地位，强调坚持创新驱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卡脖子”问题；强调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指出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针对外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sup>1</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利用外资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2004 年 3 月。

其一，外资到底属于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有学者单从要素来源角度认为外资是国际要素来源，属于国际循环的组成部分（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有学者单从市场角度认为内循环就是内需，外循环就是外需（徐奇渊，2020），可以理解为外资企业国内销售的部分属于内循环，出口国外的部分属于外循环。有学者从经济成分的角度认为外资企业落地中国，构建和延伸供应链，形成产业集群，最终成为中国产业链条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长期的运营中逐步实现本土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担任外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外籍人员在中国工作生活学习中国文化甚至安家。很多外资企业，已经融入中国经济的实体，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陈涛涛，2017）。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下，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无法割裂，因此单从某一个角度论证有失偏颇。外商投资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途径和纽带，对于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定位还缺乏一个综合性界定。

其二，利用外资是否有利于我国自主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当前我国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产业链安全，这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而自主创新，形成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价值链是否意味着外资就不再重要成为外资领域关注的重点。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外资不仅不利于自主创新和产业链升级，反而会通过低端锁定、挤出效应等抑制自主创新和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宛群超，2018；石大千和杨咏文 2018；马婧，2018）。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外资能够通过研发投入产生溢出效应、产业链关联带动技术创新，提升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刘文华，2017；唐宜红，2019，郑妍妍和李磊，2020），国内自主创新也离不开外资企业带来的全球领先技术和高科技人才参与国内技术创新攻坚。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是推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充分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中，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增强本土企业的不可替代性（聂平香和乔睿，2021）。一些学者认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立根生、自主创新。也有学者认为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腿，更不是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相反，我国产业自主可控的目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产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一种高效、开放的自主可控（程俊杰和闫东升，2021），需要一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刘世锦，2020）。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但绝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两轮驱动（赵永新，2018）。



其三,通过利用外资开放倒逼改革的这条路是否还有必要。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世界经济格局面临再平衡挑战。尤其是在国家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后,开放能够继续为改革提供强大动力成为理论和政策层面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些观点认为当前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在逐渐减弱,中国新一轮的改革主要依靠自主改革。有不同观点认为,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开放程度任然是偏低的,距离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开放水平仍然有一段距离(崔凡,2020)。到了新阶段,我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开放牵动影响全局、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开放倒逼改革的特点突显出来了(迟福林,2019),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改的都是“硬骨头”。推进改革,除了需要有勇气,还需要主动引入外部压力,以开放倒逼改革(龙永图,2018)。

### 三、外资作用和贡献研究

#### (一) 利用外资的传统理论研究

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外资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 Solow (1950) 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 FDI 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主要受到劳动和资本的限制,短期内可以影响经济增长,但长期并不能改变总产出增长率。Rostow (1960)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出了“起飞”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有效投资少,无法启动经济增长,需要引进外资提高投资占比。 Hymer (1960) 等人的垄断优势理论, Vernon(1966) 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Dunning(1977) 的国际生产折衷论, Kiyoshi Kojima (1978) 的比较优势论等,都从不同方面对 FDI 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 FDI 理论。

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有其特殊性。1966 年,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斯最早提出“两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储蓄和外汇缺口,可以通过外资弥补,通过提高资本稳态水平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秦宛顺和唐爱国,1997;卢汉林,1998;康立,2006;章昌裕,2012;刘建丽,2019)。很多学者在他们研究基础之上进行了修正和扩展,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缺口”模型,是在两缺口模型基础上增加了财政缺口,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政府投资进行经济建设,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政府税收与实际征税水平之间存在税收缺口,利用外资能够有效增加税收收入,弥补税收缺口(卢进勇等,2019)。后来学者们又发展了“技术缺口”,认为可以通过引进以技术为载体的外资,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李学彦,2004;汤文仙和韩福荣,2000;卢进勇等,2019)。

## （二）基于传统理论的外资贡献研究

根据利用外资的“缺口”理论,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的作用和贡献总结为以下几点:

### 1.外资与国内资本形成

很多学者认为外资作为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直接增加了东道国经济建设资金供给,加速了国内资本的形成,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Lardy, 1995; Kaiser, 1996; 朱劲松, 2001; 高铁梅和康书隆, 2006; 刘宏和李述晟, 2013; 甘星和印赞, 2016; 杨红丽, 2017; 刘江龙等, 2021)。学者们主要从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规模、扩大国内储蓄(Bosworth 等, 1999; 马晶梅和王宏起, 2011)、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杨新房等, 2009; 武力超, 2013; 桑百川, 2019)、形成挤入效应和互补效应带动国内资本配比,提高国内资本形成率(Noorzoy, 1979; Borensztein 等, 1998; Agosin 等, 2000; 黄华民, 2000; 杜江, 2002; 陆建军, 2003; 薄文广, 2006; 谭本艳, 2009)等方面切入研究。也有学者对外资扩大国内资本积累效应的大小产生质疑,认为从长期看外资对国内资本形成挤出效应(杨柳勇和沈国良, 2002),或者说挤入和挤出净效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不同的产业挤入挤出效应不同(王永齐, 2005; 万军, 2007; 冼国明和孙江永, 2008),甚至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并无显著的促进作用(邵锋祥和袁晓玲, 2010)。

### 2.外资与外汇储备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外汇储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从双顺差角度切入,认为流入东道国的 FDI 扩大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促进了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徐永久, 2002; 刘雪松和曹显兵, 2006; 卢锋, 2006; 房永旭, 2008; 王佳菲, 2012)。

其一,很多学者从资本跨境流动的直接效应入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的影响。比如,测算 FDI 对外汇增长的实际贡献率(何青和杨晓光, 2003);考察 FDI 对国际收支造成的顺逆差(姚枝仲和何帆, 2004);通过实证方法分析 FDI 和外汇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姚枝仲和何帆, 2004; 朱金生和杨维梁, 2005; 杨记军等, 2008; 陈安和杨振宇, 2011)。很多研究证实 FDI 带来的资本项目顺差对中国外汇储备确实存在正面作用(叶耀明和高平平, 2003; 王允贵, 2003; 郭洪仙和李晓峰, 2004; 卢方元和师俊国, 2012; 王增磊和张恒义, 2017),但同时也认识到可能带来的外汇储备的波动、人民币的稳定等问题(熊琼和付含, 2009),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 FDI 属于长期资本流入、多

以实物投资为主，不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增长，反而可能因为增加进口而降低外汇储备（余永定，1997；汪洋，2004；马敬桂，2015）等。

其二，也有很多学者从国际贸易切入，分析资本跨境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进而研究其对外汇储备的影响。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和互补关系（Mundell, 1957; Buckley & Casson, 1976; Chenery & Strout, 1966）。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得益于出口导向经济（Dooley, 2004；王增磊和张恒义，2017），外商直接投资是出口创汇的主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形成我国双顺差的结构（卢锋，2006），出口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创造的贸易顺差对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王佳菲，2012）。但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内需拉动转型，市场寻求型外资的增多，外资出口创汇的功能在逐步降低（王佳菲，2012；罗素梅和张逸佳，2015）。

### **3. 外资与税收收入**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两个方面：

其一，外资的流入促进了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比如外资流入具有增长弹性，通过直接增加涉外税收收入促进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唐礼智，2008），带动 GDP 增长间接引起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增长（陈晓等，2020），很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外资对我国税收收入具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张庆君和孙雅静，2008；杨晓丽和许垒，2011；黄翔，2012）。

其二，外资的流入对税收收入增长具有负向作用（逯建和杨彬永，2015）。比如，地方政府为引进外资采取关税减让、税收优惠，减少了应收涉外税收，给国家财政收入带来较大损失（王政，2004；胡再勇，2006；周黎安和陶婧，2009；）；区域间为引进外资采取的财政竞争降低了外资税收收入贡献（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因此取消对外商投资的税收差别待遇，统一税制，实行税收国民待遇，成为众多学者的政策呼吁（贾康和孙钢等，2005；胡再勇，2006；王延杰和陈洁，2006）。

### **4. 外资与技术进步**

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资本、管理和技术的综合体，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会扩散和溢出到本土企业，从而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姚树洁等，2006；杨红丽，2017）。早期对发达工业国的 FDI 技术外溢，通常聚焦于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等（Coe & Helpman, 1995）。随着发展中国家 FDI 流入的增加，很多研究开始关注 FDI 技术外溢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其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1960 年，MacDougall 首次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此后，Findlay(1978)的“赶超理论”和 Romer(1986)的新增长理论也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此后，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对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表示认可。他们认为，FDI 是重要的技术来源渠道，引进 FDI 可以产生技术转移效应（叶耀明等，2005）、知识溢出效应（沙文兵，2013；Amann, 2014）、竞争效应（Caves, 1974；Kokko, 1992；Bessonova, 2002；陈涛涛和陈娇，2005；Lin&Saggi2007；刘军等，2011）、示范效应（Kokko, 1990；Saggi, 2000；江小涓，2002；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Pitelis&Teece,2010），产业间垂直效应（Ariken&Harrison, 1991；Ethier&Markuse, 1996；Pack&Saggi, 1999；张宇和蒋殿春，2008；石绍炳和吴和成，2014），从而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Findlay, 1978；Bonelli, 1998；Moreir, 1999；沈坤荣，1999；胡小娟和温力强，2009）。一些学者从内生技术进步角度研究了引进 FDI 带来产品种类增加（Romer, 1986；Lucas, 1988）和产品质量提高的技术进步（Romer, 1990；Grossman&Helpman, 1991；李怀建和沈坤荣 2013）。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引进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还表现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Wang, 1990；Yudaeva 等，2003）、提升科技人员流动（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Fu, 2012）。还有学者从行业和区域的角度切入，研究了 FDI 对不同行业 and 不同区域的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 1986；Gregofio, 1992；冼国明和严兵，2005）。但是，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认为 FDI 不存在技术溢出。有学者认为 FDI 由于低根植性和低关联度，导致技术溢出效应甚微（Aitken&Harrison, 1999；Birkinshaw, 2000；廖杰，2003；阎敏，2007），有学者认为受限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在发展中国家 FDI 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Cohen 等，1989；李捷瑜和王美今，2009），甚至认为因为较大的技术差距，FDI 会通过替代效应（Stewart&James, 1982；Fransman, 1986；Kim, 1991）和挤出效应（田毕飞和陈紫若，2016）等抑制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

其三，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学习效应。主要指模仿、学习、使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已有技术和知识（Dahalman&Nelson, 1995）。外资企业为发展中国家的模仿生产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它们的学习和模仿成本（Lj 等，2001；Glass 等，2002），使得技术落后的国家学习已有技术，实现后发优势（Wang&Blomstorm, 1992）。各个国家的技术条件不同，因此模仿能力和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也有差异（Atkinson&Stigliz, 1969；Diwan, 1991）。FDI 对东道国外溢效应的大小很大程

度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模仿能力和吸收能力（Cohen 等，1989；Kokko，1994；Perez，1997；倪海青和张岩贵，2009；牛泽东等，2011）。包括东道国的制度特征（Coeetal，2000；张宇，2008；李平和季永宝，2014）、人力资本水平（Keller，1996；Borensztein 等，1998；Girma，2005；张宇，2008；鲁董景等，2016）、知识产权保护（Helpman，1993；Lai，1998；Yang&Maskus，2001；胡立君和郑玉，2014）、经济开放度（Moran，1998；包群和赖明勇，2003；黄静，2006）等。

### （三）关于外资作用的拓展研究

#### 1. 外资与就业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但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一些学者研究证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提升东道国就业水平（Boren 等，1998；Golejewska，2002；沙文兵和陶爱萍，2007；Federico& Minerva，2008；Hoi&Pomfret，2010；刘宏和李述晟，2013；许建伟和郭其友，2016；罗燕等，2020）。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东道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原因，其就业效应很小（Jenkins，2006；邵锋祥和袁晓玲，2010），或者认为 FDI 降低了东道国的就业水平（丁翠翠和郭庆然，2014；蒋勇，2017）。

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的就业效应：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并购投资方式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田素华，2004；曾国平，2006；罗燕等，2020；黄亚捷等，2018）。第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发展，间接增加就业数量（李 良，2016），而且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垂直溢出减小了本土企业的就业波动（李磊和卢坤豪，2020）。第三，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规模效应提升劳动力需求（毛日昇，2009）。第四，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促进东道国出口促进就业增长（Fu&Balasubramanyam，2005）。第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就业弹性（Todoroski，2008；毛日昇，2009；唐时达和周申，2011；周申等，2010）。刘洋和青白（2016）利用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跨国企业比国内企业的就业率会高出 25%。韩民春和张丽娜（2015）通过研究外资撤资问题，发现撤资导致了劳动参与率下降，对就业产生了负面效应。

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负的就业效应的研究：第一，外资企业并购国内企业后，出于提高效率和利润的目的调整组织架构，进行裁员，从而减少东道国就业数量（田素华，2004）。第二，FDI 通过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挤出国内企业，导致失业增加（郑月明和董登新，2008；李良，2016；李磊和卢坤豪，2020）。第三，FDI 提高一国生产技术和效率水平，可能通过技术替代效应降低

劳动力需求(毛日昇, 2009; 李良, 2016)。很多研究发现 FDI 的就业效应存在产业和区域差异。比如有研究认为 FDI 有效拉动了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 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并不明显(王燕飞和曾国平, 2006; 黎中彦和韩兆洲, 2013)。还有研究认为 FDI 有效拉动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就业, 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负(朱金生, 2013; 郭庆然, 2013)。

## 2. 外资与收入分配

其一,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资水平。很多学者研究发现, FDI 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的提高东道国劳动力工资, 改善就业质量。第一,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增加了东道国的资本存量, 提高了资本—劳动比率, 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劳动的边际产出相应增加, 使得劳动力的报酬上升(盛斌和魏方, 2012; 李莺莉等, 2014)。第二,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和商品边际收益, 从而更愿意支付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 可以直接提高东道国劳动力收入(Aitken 等, 1996; Feliciano&Lipsey, 1999; Graham, 2000; Girmaet 等, 2001; 沈桂龙, 2012)。第三外资企业通过影响东道国劳动力供需结构, 带动内资企业提高工资水平(Feenstra&Hanson, 1997; 许和连等, 2009)。第四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途径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率, 进而提高其工资水平(Hoi & Pomfret, 2010; 罗珊、黄翠珊(2012))。第五,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刺激政府加大教育投入, 进而实现劳动力素质结构升级和工资薪酬的上升(张二震和任志成, 2005; 李莺丽等, 2014)。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 FDI 促进工资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Girma 等, 1999), 甚至会导致东道国工资水平的下降(Rosoff, 2005)。尤其是我国很多行业被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 外商直接投资会抑制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刘素华等, 2007)。许建伟和郭其友(2016)研究发现, 我国人均 FDI 的持有量每上升 1 个百分点, 工资整体水平将下降 0.0197 个百分点。

其二, 外商直接投资与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抑制居民消费能力是当前我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障碍之一(傅元海, 2014)。而 FDI 进入形成的外资经济也是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力量之一。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的差异。一些研究认为外资经济扩大了收入差距。第一, 虽然外资企业工资水平较高, 但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较低, 拉大了收入差距(周明海等, 2010; 朱彤等, 2012; 孔庆洋, 2013)。第二, FDI 的流入增加了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需求, 提高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工资, 拉大了这部分人员与

非技术人员以及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差距(Goux&Maurin, 2000; 包群和邵敏 2008)。第三, 外资企业的高工资和对内资企业的低端锁定拉大了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收入水平, 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 (Chen 等, 2011; Saglam&Sayek, 2011; 于峰和卢进勇, 2014)。第四, 引资高质量倾向导致技术替代人工加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 (李平和郭娟娟, 2017)。第五, FDI 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区位选择效应加剧了城乡收入分配不均 (冷艳丽等, 2017), 一些研究认为外资经济缩小了收入差距。第一, 外资企业的大规模进入, 吸纳了大量的城镇低收入人口和农村流动人口, 一方面提升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村人口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 (周娟和张广胜, 2009; 盛斌和魏方, 2012; 郑磊和汪旭晖, 2018)。第二, 在区域战略影响下, 外商直接投资逐步向我国中西部地区扩展, 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壮大, 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 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戴枫, 2010)。第三, 外资经济提高了市场化水平, 加剧了市场竞争, 诱使内资企业模仿外资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水平, 内资企业效率提高, 工资水平上升, 内外资企业工资差距可能缩小 (Lipsey&Sjholm, 2004)。第四, 如果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足够大, 就可以抵消一部分贫富差距效应 (周华, 2006)。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 FDI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非线性的。如傅元海和李文星 (2014) 研究发现, 外资经济与全国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阈值协整关系, 何枫和徐桂林 (2009)、宋勇超和朱延福 (2013) 研究发现 FDI 的收入分配效应呈先升后降的倒 U 型等。

### 3. 外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投资通过创造新的需求, 形成新的产业而改变原有产业结构。Markusen (1999) 提出跨国公司通过关联效应能较大程度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改革开放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产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 实践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 (卢春阳和吴凡, 2009)。多年来, 很多学者从我国发展实际出发, 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王洛林等, 2000; 江小娟, 2002; 黄日福和陈晓红, 2007; 蒋殿春和王春宇等, 2020)。而一些研究结论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反而会加剧产业间的不平衡, 从而抑制产业结构的升级 (陈继勇和盛杨恽, 2009; 杨祖义, 2018)。至于具体机制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从宏观视角出发。这部分研究以 “缺口模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为理论基础,研究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东道国的资本供给(陈迅和高远东,2006;文东伟等,2009)、市场结构(Hymer,1976;Caves,1982;聂爱云和陆长平,2012)、技术创新(黄日福和陈晓红,2007)、对外贸易(Camilla,2000;Hunya,2002;宋京,2005)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的机制。例如,谢建国(2003)、文东伟等(2009)研究认为 FDI 促进了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有利于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黄日福和陈晓红(2007)从资本供给和技术溢出两个方面入手,证明了外租对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二,从资源再配置视角出发。这部分研究主要以 Syrquin, M.、Chenery, H. B. 和 Robison S(1986)提出的要素再配置效应为理论基础,研究 FDI 通过影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或部门之间的流动,及生产要素再配置,提升生产效率,产生“结构红利”(师磊和陈建先,2018),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Maddison, 1998; Peneder, 2002)。例如,郭克莎(1992)研究发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姚战琪(2009)、温杰和张建华(2010)、王恕立和滕泽伟(2015)研究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提高了东道国劳动力流动速度和效率,同时还提高了东道国的产品质量。Fernandes & Paunov(2012)、桑瑞聪等(2017)研究发现服务业 FDI 可以通过分工专业化、增加服务中间品等渠道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从而产业结构升级。蒋殿春等(2020)认为,外资具有竞争效应,外资企业进入后,通过影响区域内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引发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从而推动产业升级。Mary Amiti 等(2004)以美国为例,证明服务业国际转移与美国劳动生产率有强的相关性。Hanley(2003)以爱尔兰为例研究发现,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对其电子行业的生产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三,从三产结构变迁视角出发。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流向与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基本一致(郭欣,2009;唐艳,2011)。他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更多流入第三产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转型(聂爱云等,2012;李树桢和张峰,2020)。例如,姜建平和赵伊川(2007)、钟晓(2009)研究证明,服务业利用 FDI 与我国服务业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 FDI 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总体增长。周燕和王传雨(2008)通过分析 FDI 与三次产业增加值相对变化之间的回归关系,发现 FDI 通过提高第三产业占比和降低第二产业占比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优化作用并不明显,反而加剧了产业间的不平衡。如郭克莎(2000)实证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剧了我国三大产业



的结构偏差, 扩大了中国产业发展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陈迅和高远东(2006)研究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不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

其四, 从产业类型转变视角。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资本和技术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 促使中国的生产活动和出口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 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肖钢, 2008; 文东伟等, 2009)。贾妮莎等(2014)实证研究认为, 与短期效果相比,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长期作用更加突出。(王军(2006)认为 FDI 催生并推动了我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增长。张帆和郑京平(1999)分析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唐艳(2011)认为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其中外资的作用功不可没。

其五, 从产品结构优化视角。产品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王军, 2006)。Shelp(1981)认为引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的专业化分工, 进而提升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丰富产品的供应, 提高产品的更替升级速率。唐艳(2011)研究发现, 与我国内资企业相比, 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新产品开发投入更大, 产品升级的速度更快,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整体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 **4. 外资与自主创新**

其一, 学术界对自主创新的理解。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从国际相关研究看, 有学者认为, 发展中国家需要以引进技术为基础, 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 先发展制造能力, 然后培养创新能力(Lall, 1982; Westpjal 等, 1985)。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可能在新技术领域赶超发达国家, 但在成熟技术领域, 发展中国家很难建立起足够的技术能力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Perez&soete, 1988)。从国内相关研究看, 有学者认为“自主创新”是“技术引进”的对立物, 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创新(杨晓玲, 1999)。有学者认为是从引进到消化再到创新的过程(毛蕴诗, 2006)。有学者认为自主创新的本质是“技术突破的内生性”, 即依靠自身能力提升创新水平(施培公, 1996)。有学者从知识产权角度研究认为, 自主创新是知识产权的独立创新(柳玉林, 1997)。有学者定义了自主创新的外延, 即包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在创新”(陈至立, 2005), 并认为引进先进技术是基础, 消化吸收是关键, 实现再创新是目的(乔为国和陈芳, 2010)。有学者认为自主创新产生的成果由东道国企业自主持有(李玉梅, 2011)。有学者认为自主创新有两种基本情况, 一种是几乎完全

立足于本国力量，另一种是基本立足于本国力量，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为主，同时不排除引进部分先进和适用性技术（郭飞，2021）。还有学者从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之间关系视角研究认为，开放环境下，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彭建平和李永苍，2014）。黄传荣和陈丽珍（2013）研究认为，自主创新是内外资源协同应用的结果，应以互利共赢的开放心态对国外资源充分利用。基于对自主创新内涵和外延的定义，学者们也相应的提出了实现途径和方法。一是从提高自己创新能力角度出发,提出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增加科技投入;发挥企业主体力量,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加大人才培养等（郭飞，2021）。二是从引进消化再吸收角度出发,（武汉大学开放式创新研究课题组，2019）。提出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引进国际先进资源,吸引国外优秀人才等。

其二，外商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机理。有学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研究了 FDI 与自主创新的关系，认为 FDI 通过技术扩散、技术溢出、产业关联、学习模仿等效应提升东道国生产率从而提升创新能力（Kokko,1994; Blomstrum 等,2000; Cheung&Lin,2004; 冼国明，2005; 王红领等，2006; 王子先，2013; 毛其淋，2019; 詹江和鲁志国; 刘斌等，2021）。但是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 FDI 会拉大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本土企业间的创新差距（Haddad 等，1993; Aitken 等，1999 ; Aldaba 等，2010）。有学者从研发活动角度入手研究 FDI 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李玉梅和桑百川（2011）认为 FDI 可以产生研发国际化效应，带动和激励东道国企业设立研究开发机构，促进国内创新资源的聚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Cheung& Lin （2004）、刘星和赵红（2010）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专利申请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与此相反，刘云等（2003）、徐全勇（2007）、范承泽等（2008）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在华专利申请对国内专利申请产生替代和竞争关系，企业层面外资规模越大，东道国研发投入越少。有学者从产品创新角度切入。张雪莹（2010）认为外资企业引进了新产品，是新产品扩散的重要源头。王华等（2010）研究认为外资份额与企业新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结果并未发现 FDI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证据。有学者从发展阶段探讨了 FDI 的不同作用。

## **5.外资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于外资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直接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目前学者们主要从几个角度入手，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随

洪光（2013）认为政府因素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周忠宝等（2020）等研究认为，东道国的信息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能够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发挥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刘建丽（2020）研究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制度框架内，吸引和利用外资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间接作用方面，学术界多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白俊红和吕晓红，2017），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李晓英，2018）推动技术进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劳动者素质（李娜娜和杨仁发，2019），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田素华，2019），推动东道国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改善环境和空气质量（姜磊等，2018）等角度切入。

## 四、外资与产业集群研究

### （一）外资驱动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产业集群理论。认为现代产业集群，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集聚形式，其由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厂商、供应商、专门化协会所形成。产业集群通过公用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资源的共享，降低生产成本、信息交流成本和物流成本，产生规模集聚效应、外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竞争力（张向阳和钟新波，2012）。简单理解为关联产业因为知识、投入产出、需求等方面联系而产生的地理上的集中，是产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卢长宝，2010；高虹和袁志刚，2021）。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将地区聚集优势的来源总结为共享劳动市场、可获得低成本的中间投入、信息共享和技术外溢（李俊江和马颀，2004）。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地方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张宇，蒋殿春，2008）。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呈现出同类产业或相关产业外资企业同一区域集中的态势（徐康宁，2006）。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致可总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外资的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克鲁格曼认为，市场需求、外部经济、产业地方化促成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一旦形成就可能促进劳动者、技术、知识的流动，保证生产的规模经济（李金华，2020）。外资企业通过自我强化效应、区位优势效应、来源国效应和循环累积效应，进而推动形成和壮大地方性集群规模（Cheng&Kwan，2000；徐康宁，2006；陈健，2008；李晗斌，2012）。尤其是跨国公司进入，有助于确立集群在本行业中的领导地位，进而产生自我强化机制，吸引更多的 FDI 进入并使得集群区域成为行业内的技术中心和创新中心（张宇，

蒋殿春 2008)。通过上下游产品的迅速配套、技术与销售渠道的共享等获得规模经济 Porter (2000) 等实证研究发现, 集群存量每增加 10%, 该地区被未来投资者选中的可能性就增加 5% 至 7%。Head 等 (1995) 的研究表明, 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选址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产业集聚效应而非禀赋因素。Guimaraes (2000) 通过对葡萄牙 FDI 的定位研究发现, 由于仿效其他外国公司的决策以降低不确定性, 外国投资者可能被吸引到外国公司集中的区域。Guimaraes 等 (2000) 的研究证明硅谷 IT 集群、伦敦金融业集群的发展都得益于各大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的集聚。此外, Krugman (1993) 认为不仅是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 市场潜力也是集聚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 外资的集聚会产生外部效应。集聚生存是跨国公司之间基于各自核心竞争优势, 为获取合作伙伴的互补性资产, 以扩大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边界, 增强彼此的市场竞争地位而形成的一种事实上的相互依赖、互为客户或以联盟为基础的生存战略 (陈丽源, 2016)。一方面, 通过满足跨国公司有关专业化生产、垂直生产、价值链整合及业务外包等战略所需的知识共享、专业化人才市场、降低创新成本、降低交易与实际物流费用、实现本土化运营的需要 (郭立伟等, 2006), 从而完善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体系, 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并实现生产与创新成本的节约 (张宇、蒋殿春, 2008)。另一方面, 基于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也会出现扎堆现象 (Porter, 2000), 从而在东道国形成产业集聚。Dunning (1977) 的理论认为, 外资企业进入初期会加剧东道国竞争, 打乱东道国原有生产体系, 降低东道国的产业集中度。但是经过充分竞争后, 东道国市场的产业集中度会再次提升。Enright (2002)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 美国纽约之所以能够形成医药产业集群, 根本上是得益于来自法国和瑞典的外商直接投资。加拿大的电信服务产业集群则得益于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诸如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其三, 外资通过溢出效应推动集群升级。众多学者研究证明, 外资企业基于产业链关联需求, 密切与东道国企业的联系, 并且通过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管理实践等的溢出, 推动上下游行业的成长, 进而推动东道国产业集群的壮大 (Pesters, 2001; 王黎明和赵德峰, 2008)。外资企业基于自身创新发展, 优化升级的需求, 会通过订单升级、技术共享、知识培训等方式, 将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传递给链条上的其他企业和组织, 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提高技术水平, 提升生产效率, 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集群优化升级 (Kaplinsky 等, 2001; 卢长宝, 2010; Mukim 2015)。Guimaraes & Woodward (2000) 研究认为, 外资企业对

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存在累加效应。也就是说，龙头企业的进入会吸引更多外资企业随之进入，而且基于其自身发展，会纳入价值链的更多环节，从而提高集群整体的附加值。Thompson（2002）研究发现，形成产业集群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比分散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更多的技术转移。但引入外商投资是手段不是目的，需要系统思考期对集群升级的影响路径。

## （二）外资对中国形成产业集群的影响

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资，通过集聚区域内外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形成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涂文明，2008）。

其一，外资壮大产业集群规模。众多学者研究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推动中国形成产业集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冼国明和文东伟，2006；赵伟和张萃，2007；石卫星和吴韡，2020）。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中国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集群（Cheng& Kwan，2000；张宇和蒋殿春，2008；易会文等，2011；接玉芹，2016）。很多学者从具体行业入手，研究发现外资的大量进入产生了明显的聚集效应。例如，徐康宁和陈奇（2003）、王雷（2008）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我国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逐步形成以外资为核心的制造业集群。李娜和伍世代（2019）通过对我国产业集聚的行业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度越高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越好。

其二，外资通过集群发展推动我国形成优势产业。从产业发展经验看，我国在全球具有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造产业，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张宇和蒋殿春，2008）。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我国的汽车行业（刘新英和李清，2008）、电子信息行业的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在外国企业的前向嵌入方面，江苏的电子信息、设备和金属制造业，上海、福建与广东的重工业等都表现出关联优势。康灿华和杨灵灵（2013）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促使我国高级生产要素的累积，提高我国产品质量水平和标准合理化。周建军（2020）研究发现，世界多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业链有较大的依赖。

其三，外资通过集群发展带动国内企业成长。跨国公司作为龙头企业，通过配套产业链，带动本土企业孵化成长。相应地，本土企业通过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拓展国际市场，吸收国际先进要素。主要表现在本体企业生产产品种类的增加，产品质量的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等。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充分竞争、抢占市场，使得内资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江小娟，2002；张宇和蒋

殿春 2008; 蒋兰陵, 2011)。当前, 通过引进外资企业, 推动地区产业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用以促进产业升级, 带动就业增长, 推动经济提升的重要方式(周兵等, 2014)。

## 五、外资与消费

### (一) 新发展格局与消费关系的研究

当前学界针对国内大循环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切入, 探讨了消费与双循环的逻辑关系。包括消费升级与双循环的内在联系, 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和改革路径(李世美等, 2020)以及如何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构建供需的动态平衡(柳思维, 2021)。其二, 从宏观经济事实出发, 论证了消费与国内大循环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国际市场需求疲软, 是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栗亮和刘元春, 2004; 潘文卿等, 2015; 渠慎宁, 2018)。学者们研究发现, 2014 年至今, 消费已经成为超过投资, 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稳定的消费和追求高质量的投资已经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两大重要因素(王晋斌和厉妍彤, 2020)。因此, 在外需萎缩的背景下, 为顺利实现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 国内大市场必须形成稳健、强劲的消费力量。刘伟和刘瑞明(2021)研究认为,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8.5 亿, 占比 60.60%, 未来仍有巨大的空间释放“人口红利”, 对消费方式水平和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 拥有 4 亿多人规模的中等收入阶段, 进一步支撑着我国消费需求的稳定基础。众多学者认为, 当前阶段有必要把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压舱石”(倪红福等, 2020; 王晋斌和厉妍彤, 2020)。其三, 从改善结构、提高收入、挖掘潜力等角度切入, 聚焦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出堵点和难点, 阐述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力的应对举措。包括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提高三次分配效率, 以更加完善和健全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整体收入,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董志勇和李成明, 2020; 高伟和陶柯, 2020; 蒲清平和杨聪林, 2020; 丁一凡, 2020; 徐奇渊, 2020; 张明, 2020; 倪红福等, 2020; 王晋斌和厉妍彤, 2020); 畅通流通环节, 挖掘消费潜力, 提升消费环境, 拓展消费领域, 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任保平和苗新宇, 2021)。

## （二）外资对国内消费的影响研究

学界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匮乏。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从经济、就业、工资水平、分配结构等角度入手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消费的影响。尹希果等（2005）对居民消费水平、商品出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型特征。建议利用外资优化消费结构，培育国内的消费市场和通过优化消费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霍杰（2015）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韩民春和张丽娜（2015）研究了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的就业效应。二是从动态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产业选择、全球价值链重构等角度分析了消费对外商投资促进作用。王丽和张岩（2016）认为中国拥有雄厚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能满足投资企业的市场需求。陈志恒和季希春（2019）研究认为，中国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和消费市场，能够促进国际高端服务业的内向转移和集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有利于中国发挥主导作用。

## 六、外资与全要素生产率

###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张文魁，2018），就是考虑所有投入品之后得到的生产率，它在加权的基础上将所有生产要素（材料、人工、维护、公用事业等）量化为一个表达式（Poe&Mechem，1983），测算总产出量与全部生产要素真实投入量之比。早期 John W.Kendrick 发展了全要素生产率并应用于测量经济体内行业整体经济的总生产率。目前学术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如测算具体区域、选定行业和特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速（Volek&Novotná，2015；Kim &Par，2018；Levenko，2019；Hamia，2020）。例如，利用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回归等式，分解总要素生产率，采用数据包壳分析（DEA）方法进行输入输出分析（Li 等，2013）等。二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如研究能源、投资、技术、劳动力、环境、贸易、政治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Ranis，2007；Sangho，2016；Haider 等，2021），并从国家、城市、产业、企业等多个维度对该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Boussemart 等，2017；Bergeaud 等，2017；庄芹芹，2021）。

## （二）外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其一，促进论。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的总要素生产率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Liu&Wang（2003）研究了中国工业部门横截面样本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外资的存在、研发水平和企业规模是提高中国产业 TFP 水平的最重要因素。Fukao&Yukako（2005）通过分析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调查外资企业是否比国内企业更有生产力，发现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本国研发强度、有形资产和工资增长率的提高。Pessoa（2005）以 1985-2002 年间 16 个经合组织国家数据为样本，使用了面板数据方法，研究了 FDI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FDI 对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可能是因为 FDI 是国际技术转让的渠道。Elsadig（2008）考察了 FDI 流入对人力资本、劳动力、吸收能力和实物资本的影响，发现 FDI 在通过 TFP 的贡献所推动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Arisoy（2012）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溢出对 TFP 和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Baltabaev（2013）利用 1974-2008 年间 49 个国家的小组数据，发现 FDI 存量增加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积累，技术落后的国家吸收前沿技术的能力也在提高。Iwasaki 等（2015）研究发现，FDI 对 TFP 的积极影响可能会在获得大量外国资本的地区增加，而且发现 FDI 与当地研发潜力之间产生了积极的协同效应。Ayesha 等（2016）利用 2003 年至 2011 年期间 123 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小组数据，发现绿地外国直接投资对 TFP 没有显著影响，而跨境并购对 TFP 在总样本中具有积极影响。Zhu&Ye（2018）采用超 SBM 模型分析了 FDI 对中国包容性绿色总要素生产率影响，发现有积极作用。国内学者也通过实证模型分析和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中，杨向阳和童馨乐（2013）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从细分情况看，对技术进步增长率影响为正，对技术效率增长率影响为负。李佳和汤毅（2019）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进步，显著促进了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对技术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其二，抑制论。Damijan（2003）通过使用 1994-1998 年期间的公司数据研究了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直接技术转让的影响及其对八个转型国家本地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影响，发现技术主要是通过直接的外国联系转移给本地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会为国内公司带来积极的行业内溢出效应。刘舜佳（2008）通过时间序列模型研究发现，在短期内 FDI 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



FDI 和国际贸易在长期却会降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刘舜佳和王耀中（2012）研究认为 FDI 在区域内产生了正向溢出、在区域间产生了负向溢出，FDI 空间溢出总效应弱化了全要素生产率。Filiz&Kadi（2014）通过金砖四国和土耳其的经验分析，发现 FDI 是资本、新技术和无形资产（如组织和管理技能）的来源，但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促进样本国家的技术变革，反而对这些国家的 TFP 有负面影响。王贞力和林建宇（2018）研究了 FDI 对东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 FDI 没有促进东盟全要素增长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

其三，行业层面。Wang（2010）用 197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数据，对加拿大 80 个制造业的 FDI 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 FDI 通过前向和落后的行业间联动对总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有强烈影响。Sailesh（1999）将银行的总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然后进行面板回归，以确定 FDI 对银行总要素生产率的影响。Köse（2009）等使用 1966-2005 年间 67 个国家的年度数据，和大量的工业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研究了金融开放度与 TFP 增长之间的经验联系。发现金融开放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Fernandes&Caroline（2011）使用智力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外资促进了智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力。Demir 等（2016）基于垄断竞争模式的经验结果研究发现，外国投资者面临更高的进入壁垒，对东道国过去 TFP 水平的反应更强，FDI 也比其他形式的投资更能改善未来的 TFP。Eita（2021）通过调查安哥拉总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因素发现，FDI 对所有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积极影响，尤其是经济开放程度和汇率的贬值，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从国内看，方健雯（2009）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刘凯和彭小雨（2015）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Liu 等（2016）利用内源性增长理论框架，使用 1328 个公司级数据估计模型研究发现，生产力差距限制了 FDI 对 TFP 的影响，而外国参股则加强了外国合作伙伴的技术转让，从而增加了中国电子行业的 TFP。邱斌等（2008）研究发现，FDI 从总体上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七、外资与制度变迁

### （一）经济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C.North）在 1973 年最早提出。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在社会认知的进步、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的变革、制度安排的组织成本等因素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原有制度无法满足获利需求的情况下，既得利益者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为目的进行的制度创新（North, 1976）。拉坦（V.W. Ruttan）延续和推进了诺思的观点。他认为，制度变迁更多的是社会或者组织知识进步的结果（Binswanger&Ruttan, 1978）。Gruchy（1985）在《比较经济制度》中总结了影响经济制度变动的若干变量，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经济体制、政府在这个制度下执行的政策、经济活动的结果、评价经济活动成果的标准、经济活动的质量。林毅夫（1989）则认为，经济制度是一种“产品”，认为制度的变迁来源于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他还把经济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 （二）外资与经济制度变迁

其一，外资影响经济制度变迁的原因。从外资角度看，外资首先具有资本属性。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的本性是无休止的攫取高额利润，有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sup>2</sup>。在扩张本性的驱使下，资本“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sup>3</sup>。资本的本质和扩张性决定了它必然打破束缚其发展的各种限制，扫除建立世界市场的障碍，使得整个世界成为资本价值增值的场所（王作印，2007；郭宏，2015）。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前，这种扩张更多的表现为武力征服，而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更多的表现为国家发展形态的趋同。其次外资具有制度属性。作为既得利益者，外资在世界各处推广和输送市场经济制度的动力（郭宏，2015），并通过游说、博弈、溢出等方式影响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行为（Hillman&Hitt, 1999；李健，1999；郭宏，2015；Acemoglu 等，2015）。从东道国角度看，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外资企业，具有市场化的企业制度和运营方式，熟悉掌握国际通行规则，追求市场自由、产权独立、竞争公平的制度环境，这些正是转型国家的产业和企业所欠缺的特质。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东道国会主动放松规制，转变经济政策，改革国

---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48 页，第 391 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07 页。

内经济制度，如放宽产权约束、出台激励政策、改变管理方式等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张炜和景维民，2012；黄玖立等，2018）。东道国需要同时维护自己的目标，如增加当地股权比例、增强当地控制权、寻求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等，表现为东道国规制手段和方式的不断演进（邱立成等，2003）。

其二，外资对转型经济体制度变迁的作用。学术界将国际或外部力量对东道国制度变迁的影响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导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89；郭宏，2015）。其中，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指外部力量通过武力手段强行逼迫东道国进行制度变革。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指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东道国通过内部化调节国内制度结构，达到提升制度效率的过程（Thomas，2002）。大工业时期，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制度变迁主要的外部力量，以“变革施动者”的角色（郭宏，2015），在转型国家的经济制度建中发挥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但是关于外资对转型国家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学术界观点各异。大多数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转型经济体的制度变革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中国为例，众多学者研究认为，外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改变了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构成，对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储祥银，1996；桑百川，2000；张彩云和李计广，2018）；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带来了新的分配机制和理念（罗长远，2005；孙杰，2006；王霞，2010 王子先，2008）；带来了市场经济要素，推广了市场经济概念，催生了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各类要素市场，满足了外资企业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江小娟，2019）；带来了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加快了企业制度的变迁，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刘建丽，2019）等。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中发挥了间接的、结构性的影响，起到了“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诱导性制度变迁作用。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不能高估外资对中国的作用，有一些学者甚至否定外资影响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外资对国内制度变革和战略决策的影响十分有限（Pearson，1991；Feng，2006）从这些研究中不难发现，导致学术界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研究者观察外资施加影响的机制的不同所致。

## 八、文献评述

通过梳理、归纳和总结相关文献，发现学术界对我国外资发展形势、贡献和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已非常成熟，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方面为后

续学者们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一些领域也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

第一，学术界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讨论已经十分广泛，但对于双循环的概念仍存在较大争议，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外延尚缺乏明晰的界定；对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但对相互促进作用的机制分析相对匮乏。

第二，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现有文献多从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背景、内涵外延、经济意义、政策建议等角度切入，专门针对对外开放在其中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聚焦于外商投资的作用的研究更加少见。

第三，针对外商投资的研究，现有文献涵盖了各个发展阶段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机制。但是，在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新变化、新要求下，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在强调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大国市场优势，促进高质量发展等现实需求下，是否还需要以及如何积极利用外资？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些重大现实问题还需进一步开展探讨。

第四，针对外商投资作用机制的研究，现有文献从外商投资的经济效应、溢出效应、集聚效应、环境效应、全球价值链攀升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外商投资的经济影响。总体上，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一种影响因素的研究，针对多重因素的综合分析相对较少。特别是，有关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针对外资对中国经济整体影响的分析，专门针对国内大循环的研究还不多见。

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将围绕外资对于国内大循环的作用机制，展开相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

## 参考文献

- [01] Aitken N D. The effect of EEC and EFTA on European trade: A temporal cross-sectional analysi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 (5): 881-892.
- [02] Ari Kokko. Technolog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 [03] Aitken B, Harrison A, Lipsey R. W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40(5): 345-371.
- [04] Allan S Carrie. From integrated enterprises to regional clusters: The changing basis of competition[J].Computers in Industry,2000, 42(2-3): 289-298.
- [05] Arteta C, Eichengreen B, Wyplosz C. When Doe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Help More Than It Hu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w8414),2001.
- [06] Antràs P, Helpman E. Global Sourcing[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 552-580.
- [07] Branstetter L, Kusaka Y, Minato K, et al.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hannel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Japan's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68(2): 325~344.
- [08] Aleksandr Kljucnikov, Jaroslav Belas, Ludmila Kozubikova, Pavla Pasekova. The Entrepreneurial Perception of SME Business Environment Quality in the Czech Republic[J]. Journal of Competitiveness, 2016(1).
- [09] Baldwin R E. Global supply chains: why they emerged, why they matter,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J]. CEPR Discussion Papers,2012.
- [10] Edmar L Bacha. A Three-Gap Model of foreign transfers and the GDP growth r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0,32(2):279-296.
- [11] Birkinshaw, Julian. Upgrading of industry clusters and foreign investment[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2000, 30 (2) :93-113.
- [12] Barry, Frank, Holger Görg, Eric Strob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gglomerations,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3, 139(4):583-600.
- [13] Brandt L, Biesebroeck V,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 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2, 97(2): 339-351.

[14] Banerjee A, Duflo E, Qian N. On the road: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11(1): 1-53.

[15] Bert M Balk. A novel decomposition of aggreg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20, 53 (2):95–105.

[16] Bertrand M, Duflo E, Mullainathan S.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Estimate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7] Coughlin C, Terza J, Arromdee V. Stat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ocation of FDI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 73(2):675-683.

[18] Chenery H B, Strout A.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56(4):679-733.

[19] Cowling K, Sugden R. Market exchange and the concept of 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alysing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British review of economic issues*, 1987, 9( 20) : 57-68.

[20] Cho K R. Foreign banking presence and banking market concentration: the case of Indones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0,27( 1) : 98-110.

[21] Chadee, Doren D, Qiu F. Foreign ownership of equity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A pooled cross section-time series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1,52(2):123-133.

[22] Choi S B, Lee S H, Williams C.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J]. *Research Policy*,2011,40(3): 441-452.

[23] Calegario, Cristina L L, Bruhn N C P, Figueira, M, Alcântara, J. N.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of the insertion in the local and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sta de Administração Mackenzie*,2019,20(6): 1-29.

[24] Cadestin C, Backer K D,James I D, Miroudot S, Ye M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New insights on the trade-investment nexus[R]. *OECD*,2018.

[25] Dayal-Gulati A, Husain A M. Centripetal forces in China's economic take-off [J]. *IMF Staff Papers*,2000 ,40(3): 364-392.

[26] Duranton G, Puga D.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27] Dennis P, Quinn , A Maria Toyoda. Doe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Lead to Growth?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8, 21(3): 1403-1449.

[28] Dominick Salvato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287页.

[29] Edison H J, Levine R, Ricci L, et 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NBER Working Papers, 2002, 18(3):432-463.

[30] Ellison G, Glaeser E L, Kerr W R. What cause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100(3):1195–1213.

[31] Färe R, Grosskopf S, Norris M, Zhang Z.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66–83.

[32] Foster L, Haltiwanger J, Krizan C J. Market selection, realloc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the US. Retail trade sector in the 1990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6, 88(4): 748-758.

[33] Franco C. Export and FDI motiva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S. Foreign subsidiari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3, 22 (1): 47-62.

[34] Fernández, Klein, Rebucci, Schindler and Uribe. Capital Control Measures: A New Dataset [J]. IMF Economic Review, 2016, 64 (3): 548-574.

[35] Franz Haider, Robert Kunst, Franz Wir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ts components, and drivers[J]. Empirica, 2021, 48 (1):283–327.

[36] Griffin K B. Foreign Capital, Domestic Saving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Bulletin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0,32(2):99-112.

[37] Grabber G. 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 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A].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o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1993.

[38] Grilli V, Milesi—Ferretti G M.Economic Effects and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Controls [J]. Staff Pape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5, 42(3): 517-551.

[39] Guimaraes P, Figueiredo O, Woodward, D.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rtugal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0, 47 (1):

115~135.

[40] Giannetti M, Liao G, Yu X. The Brain Gain of Corporate Boards: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4):1629–1682.

[41] Gustavo J Bobonis, Howard J Shatz. Agglomeration, Adjustment, and State Policies in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7, 89 (1):30-43.

[42] 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 Redefining the Contours of 21st Century Capitalism[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43] Gilbert Cetto.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Advanced Countries: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Product Monitor*,2017,32:6-24.

[44] Gilbert, Cetto. Which role for ICTs as a productivity driver over the last years and the next future?" *Digi World Economic Journal*, 2015,100: 65-83.

[45] 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76.

[46] Head K, Ries J, Swenson D.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5, 38(3):223~ 247.

[47] Hillman A J, Hitt M A.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A model of approach,participation,and strategy decis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4): 825-42.

[48] Hui Feng. The Politic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dragon goes global[M].Routledge, 2006.

[49] Iacovone L, Javorcik B S. Multi - product exporters:Diversification and micro-level dynamics [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723,2008.

[50] J Levin, A Avhandling.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Ekonomiska forskningsinstitutet vid Handel shgsk, 1992.

[51] Julian Birkinshaw. Regional cluster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dependence, dependence, or Interdependence[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2000, 30(2): 114-125.

[52] Javorcikb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174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 (94):605-627.

[53] Joseph G. Altonji, Todd E. Elder, Christopher R. Taber. Selection on Observed



and Unobserved Variable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atholic Schools. 2005, 113(1):151-184.

[54] Jeanne O, Subramanian A, Williamson J. Who Needs to Open the Capital Account? Washington, D 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55] Jeon Y, Park B I, Ghauri P 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pillover Effects in China: Are They Different Across Industries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Level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3, 26(1): 105~117.

[56] 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9, 9 (4) :469-479.

[57] Keith Head, John Ries, Deborah Swenson.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38(3):223—247.

[58] Kumbhakar S C, Lovell C A Knox.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9] Kaplinsky and Morris.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M]. Prepared for the IDRC, 2001.

[60] Kawai M, Wignaraja G. Asian FTAs: Trend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1, 22(1):1-22.

[61] Linda L. Tesar. Capital Mobility: The impact on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row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39(3):385-389.

[62] Lorenzoni G, Lipparini A. The leveraging of inter-firm relationships as a distinctiv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 (4), 317–338.

[63] Lipsey R, F Sjöhol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s in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8299, 2001.

[64] Leonid Grigoryev. Transformation Without Foreign Capital: Ten Years Later [J].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2002, 44 (12)

[65] Liang F H.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Technology Spillovers, Industry Linkages and Firm Capabilities. [J] Research Policy, 2017, 46(1): 138~159.

[66] Lu Y, Tao Z, Zhu L. Identifying FDI Spillove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7(7): 75~90.

[67] Margaret Pearson. Joint Ven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tro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Socialism[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68] Markusen J R, Venables A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catalys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 (2) : 335-356.

[69] Martin J Conyon, Sourafel Girma, Steve Thompson, Peter W Wright. The productivity and wages effects of foreign acquisition in the UK[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2, 50(1): 85-102.

[70] Melitz, M.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71: 1695-1725.

[71] Magiera S. Indonesia's Investment Negative List: an evaluation for selected services sectors[J].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11, 47(2):195-219.

[7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January,2019.

[73] Patrie A. The regional cluster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J],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1994,37:78-83.

[74] 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5.

[75] Poncet, S.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1): 1- 21.

[76] Phene A, Almeida P. Innovation in multinational subsidiaries:The role of knowledge assimilation and subsidiary capabil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 2008,39(5), 901–919.

[77] Philippe Aghion et al.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cumben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9, 91(1): 20-32.

[78] Puga D. The magnitude and caus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Regional Science, 2010,50(1):203–219.

[79] Pritish Kumar Sahu, Sakiru Adebola Solarin. Does higher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lead to spillover? Evidence from Indian manufacturing.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Summer 2014, 48(3): 175-193

[80] Pritish Kumar Sahu, Sakiru Adebola Solarin. Does higher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lead to spillover? Evidence from Indian manufacturing[J].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2014, 48 (3), 175-193.

[81] Quinn D. The correlat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 91(3): 531~551.

[82] Rosenthal S S, Strange W C. The determinants of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 2001, 50 (2):191–229.

[83] Reisen H, Soto M. Which types of capital inflows foster developing-country growth? [J].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1, 4(1):1-14.

[84] Sun H, Chai J.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ter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in China[J]. World Economy, 1998, 25 (2/3/4):424-447.

[85] Sleuwaegen L , Goedhuys M . Growth of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Cte d'Ivoi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 68(1):117-135.

[86] S O Riain. The Politics of high-tech growth: Developmental network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87] Sailesh Tanna.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J]. Managerial Finance. 2009, 35, (3): 297-311.

[88] Schularick M, Steger T M.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wo Era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89] Song Z, K Storesletten, F Zilibotti. Growing Like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1):196—233.

[90] Storesletten K, Zilibotti F. China's great convergence and beyond[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4, 6(1):333—356.

[91] Sanghita Mondal, Manoj Pant. FDI and firm competitiveness: Evidence from indian manufacturing[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14, 49(38) :56-64.

[92] Steven Globerman. A new era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25(1):5-10.

[93] Taylor L. A Three-Gap Model, problem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1990s[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990.

[94] Thomas G Moore.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95] Wolfgang Keller, Stephen R Yeapl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the The United States[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9504,2003.

[96] William Reinsch, Jack Caporal. Key Trends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rough 2030[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20).

[97] [美]R·科斯, A·阿尔钦, D·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98] [美]西蒙·库兹涅茨. 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M]. 常勋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99]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100] [美]阿兰·G·格鲁奇. 比较经济制度[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101] [美] T·W·舒尔茨. 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J]. 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 1968(50).

[102] 埃冈·纽伯格, 威廉·达菲. 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M]. 商务印书馆, 1986.

[103] [美] R.H. 科斯, 阿尔钦, 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104] 宾斯旺格, VW 拉坦. 诱致性创新:技术、制度与发展[M]. 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05] 储祥银.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经济转轨[J]. 国际贸易, 1996(10):12-15.

[106] 陈健. 集聚效应、路径依赖和外商投资分布演化——基于江苏省装备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考察[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08):50-56.

[107] 陈敏, 桂琦寒, 陆铭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 ——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08(01):125-150.

[108] 陈继勇, 雷欣, 黄开琢. 知识溢出, 自主创新能力与外商直接投资[J]. 管理世界, 2010(07):30-42.

[109] 陈彦斌, 姚一旻.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2007年[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0(05):20-28.

[110] 崔日明, 张志明. 服务业 FDI 与我国服务业结构优化: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1):61-69.

[111] 陈丰龙, 徐康宁. 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05):44-56.

[112] 陈奇星.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探索与思考[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 (06):25-28.

[113] 陈诗一. 资源误配、经济增长绩效与企业市场进入: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二元视角[J]. 学术月刊, 2017(01):43-56.

- [114] 曹晓路,王崇敏.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事中事后监管创新研究[J]. 行政管理改革, 2019(05):37-44.
- [115] 才国伟,杨豪. 外商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要素市场扭曲[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10): 42-60.
- [116] 崔凡,苗翠芬. 中国外资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未来[J]. 国际经济评论, 2019(05):20-33.
- [117] 才国伟,杨豪. 外商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要素市场扭曲[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10):42-60.
- [118] 陈抗,战绍磊. 规模经济、集聚效应与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J]. 现代经济探讨, 2019(12):85-91.
- [119] 陈彦斌. 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消费与有效投资[J]. 经济评论, 2020(06):11-15.
- [120] 崔凡. “双循环”格局推动开放进入新阶段[J]. 中国外资, 2020(21):
- [121] 程俊杰,闫东升. 自主可控、产业识别与政策选择——区域情境下提升产业影响力、控制力的分析框架[J]. 学习与实践, 2021(02):
- [122] 陈喆,钟艺玮.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进步、局限与完善[J]. 国际商务研究, 2021(04):87-97.
- [123] 陈强远,钱则一,陈羽,施贞怀. FDI 对东道国企业的生存促进效应——兼议产业安全与外资市场准入[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07):137-155.
- [124] 杜晓燕. 产业集群:东道国吸引 FDI 的特殊优势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05(1): 80-84.
- [125] 戴翔,张二震,张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重塑[J]. 中国经贸, 2020(11):11-17.
- [126]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9):04-16.
- [127] 范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经济内涵与实践路径[J]. 经济学家, 2020(05):27-35.
- [128] 郭立伟,杨哲等. FDI 区位集聚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06(11):40 — 45.
- [129] 郭进,徐盈之,王书斌. FDI 区位变迁与制造业区际转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10):121-131.
- [130] 郭宏. 外资对中国转型的影响——制度视角的政治经济分析[J]. 社会科学家, 2015(12):61-67.
- [131] 高凇.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模式下事中事后监管[J]. 国际商务研究, 2017(01):30-40.

- [132] 郭晓丹,张军,吴利学. 城市规模、生产率优势与资源配置[J]. 管理世界(月刊), 2019(04):77-89.
- [13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性”优势, 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J]. 管理世界, 2020(1):1-44.
- [134] 高帆. 如何理解和挖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N]. 社会科学报, 2020 年 3 月, 第 2 版.
- [135] 高虹,袁志刚. 产业集群的规模与效率影响[J]. 财贸经济, 2021(02):119-133.
- [136] 贺敬芝,孙云. FDI 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反思[J]. 世界经济研究, 2005(11):16-20.
- [137] 刘畅. 基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变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4(09):31-34.
- [138] 黄翔. 关于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完善之思考[J]. 国际贸易, 2016(06):59-62.
- [139] 黄玖立,房帅,冼国明. 外资进入与东道国国家治理能力提升[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06):96-108.
- [140] 黄群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9-16.
- [141] 金玉国. 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 财经科学, 2001(02):24-28.
- [142] 江小涓. 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06):4-14.
- [143] 江小涓. 跨国投资, 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J]. 经济研究, 2002(09):31-38.
- [144] 吉缅甸. FDI 与制造业工资关系的经验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 2007(10):58-63.
- [145] 蒋兰陵.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配套产业链升级的影响[J]. 中国科技论坛. 2011(02):39-44.
- [146] 贾妮莎,韩永辉,邹建华. 中国双向 FDI 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11):109-120.
- [147] 靳来群,林金忠,丁诗诗. 行政垄断对所有制差异所致资源错配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04):31-43.
- [148] 江小娟. 新中国对外开放 70 年:赋能增长与改革[J]. 管理世界, 2019(12):1-15.
- [149] 蒋殿春,王春宇.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J]. 南开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0(04):32-43.

[150] 江小涓, 孟丽君.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管理世界, 2021, 37(01):01-19.

[151] 江小涓, 孟丽君. 内循环为主, 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管理世界, 2021(01):

[152]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 诱致性创新与强制性变迁[J]. 卡托杂志, 1989, 09(01).

[153] 李炳炎. 论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J]. 经济问题, 1998(01):10-13.

[154] 李健. 转轨经济中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理论分析[J]. 中国经济问题, 1999, (03):33-39.

[155] 刘小玄. 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产业绩效水平的决定因素[J]. 经济研究, 2003(01):21-29.

[156] 梁琦.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J]. 世界经济, 2003(09): 29-37.

[157] 李俊江. 地区聚集和合作优势: 以信息产业跨国投资为例[J]. 世界经济, 2004(09):28-32.

[158] 罗长远. 外国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59] 李平, 钱利. 进口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各地区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J]. 财贸研究, 2005(06):40-45.

[160] 路风. 走向自主创新: 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61] 路江涌.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效率的影响和渠道[J]. 经济研究, 2008(06):95-106.

[162] 李方安.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发展[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12):69-86.

[163] 刘新英, 李清. FDI 对我国汽车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08, (04):25-75.

[164] 李晓钟, 张小蒂.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及地区差异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09):77-87.

[165] 李玉红, 王皓, 郑玉歆. 企业演化: 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J]. 经济研究, 2008(06):12-24.

[166] 罗茜. FDI 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推动的实证分析[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8(03):105-112.

[167] 林青, 陈湛匀. 我国以 FDI 形式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测度研

- 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01):60-66.
- [168] 罗党论, 刘晓龙. 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J]. 管理世界, 2009(05):4559-4572.
- [169] 刘和东, 施建军. 自主创新, 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09(15):80-81.
- [170] 李春涛, 宋敏.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所有制和 CEO 激励的作用 [J]. 经济研究, 2010, (05):135 -137.
- [171] 李晗斌. FDI 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研究[D]. 吉林大学. 2011.
- [172] 刘晓成, 蒋士成, 费方域. FDI 的区位选择和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经济集聚[J]. 华东经济管理, 2012(01):55-58.
- [173] 李淼, 崔凡, 邓兴华. 内需与外需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J]. 国际经济合作, 2016(02):49-54.
- [174] 蓝庆新, 刘昭洁, 彭一然.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基于 2003 -2014 年 31 个省市的空间差异研究 [J]. 南方经济, 2017(01):111 -126.
- [175] 刘笋, 许皓. 竞争中立的规则及其引入[J]. 政法论丛, 2018(10):53-64.
- [176] 刘海云, 丁磊. FDI 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8(02):146-155.
- [177] 李娜, 伍世代. FDI 嵌入及制造业集聚跨区域生产网络演化[J]. 投资研究, 2019(10):04-15.
- [178] 刘大洪. 市场主体规则平等的理论阐释与法律制度构建[J]. 中国法学, 2019(06):185-201.
- [179] 刘建丽. 新中国利用外资 70 年:历程、效应与主要经验[J]. 管理世界, 2019(11):19-37.
- [180] 李宇英. “竞争中立” 规制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02):166-176.
- [181] 吕冰洋, 贺颖. 分权、分税与市场分割[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3):54-66.
- [182] 刘戒骄, 王德华. 所有制结构创新与民营经济发展[J]. 财经问题研究. 2019(07):04-11.
- [183] 刘元春. 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J]. 山东经济战略研究, 2020(11):44-45.
- [184] 刘志彪. 新冠肺炎疫情下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与全球产业链集群重构[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04):16—24.
- [185] 刘志彪. 双循环格局下的链长制:地方主导型产业政策的新形态和功能探



- 索[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110-118.
- [186] 刘志云, 温长庆. 《外商投资法》与公司企业法的衔接与协调[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1(03):115-160.
- [187] 郎昆, 刘庆. 资源错配的来源、趋势与分解[J]. 经济学报, 2021(06):1-25.
- [188] 刘志彪, 孔令池. 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08):20-36.
- [189] 刘雅婕, 熊艳艳, 姚先国. 要素市场化改革对资源错配的影响[J]. 财经纵横, 2021(11):139-142.
- [190] 聂爱云, 陆长平. 制度约束、外商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02):136-145.
- [191] 聂平香, 乔睿.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稳定的思路及建议[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04):102-105.
- [192] 邱立成, 洪涌, 柴正猛. 东道国政策变迁和外国直接投资[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05):52-58.
- [193] 孙杰. 外商直接投资与制度创新[J]. 中国改革, 2006(11):18-20.
- [194] 桑百川. 外商直接投资下的经济制度变迁[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 [195] 邵敏, 包群. 外资进入对国内工资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0(11):105-113.
- [196] 盛斌, 毛其淋.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J]. 世界经济, 2011(11):44-66.
- [197] 孙江永, 冼国明. 产业关联、技术差距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J]. 世界经济研究, 2011(04):55-61.
- [198] 宋勇超, 朱延福. 外商投资、市场分割与收入差距——基于我省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3(07):57-64.
- [199] 孙晓华, 王昀. 企业所有制与技术创新效率[J]. 管理学报, 2013(10):1041-1047.
- [200] 桑瑞聪, 彭飞, 熊宇. 服务业 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J]. 现代经济探讨, 2017(06):56-63.
- [201] 师磊, 陈建先. 服务业 FDI 对产业生产率影响及要素再配置效应[J]. 学习与实践, 2018(10):29-36.
- [202] 石卫星 吴韡. 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制造业为例[J]. 宏观经济研究. 2020(10):58-70.
- [203] 苏剑, 邵宇佳, 陈丽娜. 中国市场一体化进程:趋势、成效与建议[J]. 社会科学辑刊, 2021(03):157-170.

- [204] 盛朝迅.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J]. 改革, 2021(02):1-13.
- [205] 任保平, 苗新宇. 新经济背景下扩大新消费需求的路径与政策取向[J]. 改革, 2021(03):14-25.
- [206] 苏剑, 邵宇, 陈丽娜. 中国市场一体化进程: 趋势、成效与建议[J]. 社会科学辑刊, 2021(03):157-170.
- [207] 孙博文, 尹俊. 交通投资何以实现高质量的市场一体化? ——基于地理性与制度性市场分割的视角[J]. 宏观质量研究, 2021(01):113-128.
- [208] 桑百川.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变迁与前景展望[J]. 中国流通经济, 2021(11):112-119.
- [209] 涂正革. 全要素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基于对1995—2004年28个省市大中型工业的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07(04):14-36.
- [210] 田泽永, 江可申, 江宏. FD 溢出效应对民营经济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0(01):11-17.
- [211] 唐宜红, 俞峰, 王晓燕. 中国服务企业是否从服务业 FDI 中获取创新? ——来自第二次经济普查和专利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3):131-143.
- [212] 唐宜红, 俞峰, 李兵.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企业专利数据的实证检验[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72(01):104-120.
- [213] 王小鲁.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 经济研究, 2000(07):03-15, 79.
- [214] 王成岐, 张建华, 安辉.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J]. 世界经济, 2002(04):15-23.
- [215] 王红领, 李稻葵, 冯俊新. FDI 与自主研发: 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02):44-56.
- [216] 王作印. 世界历史论域中的资本及其当代意蕴[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7, (04):72-75.
- [217] 王雷. FDI 驱动型集群演化机制及其锁定效应[J]. 改革, 2008(03):47-52.
- [113] 王子先. 利用外资对我国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J]. 开放导报, 2008(04):38-40.
- [218] 王黎明, 赵德峰. 利用 FDI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研究综述[J]. 生产力研究, 2008(20):168-173.
- [219] 文东伟, 冼国明, 马静. FDI、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J]. 管理世界, 2009(04):96-107.

- [220] 王霞. FDI 影响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基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视角经济问题[J]. 经济问题, 2010(02): 54-58.
- [221] 王晶晶, 黄繁华. 集聚视角下服务业 FDI 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3(10): 63-69.
- [222] 王琴梅. 基于扩大内需的区域经济合作与全国市场一体化[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9(01): 153-159.
- [223] 王耀中, 欧阳彪. 服务业 FDI、技术进步与产业安全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2): 68-72.
- [224] 王思琛, 任保平. 新经济背景下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理论机理、基本架构与实现路径[J]. 经济体制改革, 2021(05): 20-26.
- [225] 冼国明, 严兵. FDI 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J]. 世界经济, 2005(10): 18-25.
- [226] 徐康宁. 产业聚集形成的源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27] 谢里, 曹清峰. FDI 渗透与产业集聚——中国制造业行业差异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04): 48-57.
- [228] 肖琬君, 冼国明, 杨芸. 外资进入与产业结构升级: 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03): 33-45, 135, 136.
- [229] 邢自强. 外资企业如何看待中国的双循环? [J]. 中国外资, 2020(21): 20-21.
- [230] 谢非, 袁露航, 傅炜. 长三角区域何以实现高质量市场一体化? ——基于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视角[J]. 改革, 2021(06): 112-124.
- [231]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J]. 《求是》. 2021(01).
- [232] 尹世杰. 消费经济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233] 姚战琪. 生产率增长与要素再配置效应: 中国的经验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9(11): 130-143.
- [234] 姚战琪. 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基于中国服务业 FDI 视角的研究[J]. 国际贸易 2013(08): 12-17.
- [235] 颜银根. FDI 区位选择: 市场潜能、地理集聚与同源国效应[J]. 财贸经济, 2014(09): 103-113.
- [236] 阳立高, 李婷, 杨华峰, 龚世豪. FDI 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 科学决策, 2017(07): 51-67.
- [237] 袁冬梅, 信超辉, 于斌. FDI 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05): 126-138.
- [238] 杨仁发, 李娜娜. 产业集聚、FDI 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J]. 国际贸易问

题. 2018(06):68-81.

[239] 余稳策. 新中国 70 年开放型经济发展历程、逻辑与趋向研判[J]. 改革, 2019(11):5-14.

[240] 余淼杰. “大变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0(06):

[241] 杨洋, 黄宁. 中国 FDI 发展路径的“转型假说”[J]. 经济学家, 2021(08):13-21.

[242] 杨英杰, 张启迪, 朱家祯.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若干建议[J]. 行政管理改革, 2021(01):18-25.

[243] 杨力. 论外商投资立法的竞争性牵引与治理[J]. 政法论丛, 2021(08):49-58.

[244] 郑毓盛, 李崇高. 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01):64-72.

[245] 祖强, 孙军. 跨国公司 FDI 对我国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的影响[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5(05):28-32.

[246] 张娟.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分析[J]. 亚太经济, 2006(06):85-88.

[247] 赵伟, 张萃. FDI 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基于 20 个行业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7(11):82—90.

[248] 张宇, 蒋殿春. FDI、产业集聚与产业技术进步[J]. 财经研究, 2008(01):72-82.

[249] 张国强. FDI、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基于 Nash—Cournot 均衡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08(08):218-220.

[250] 张海洋. 我国工业 R&D 生产效率和影响因素——基于省级大中型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08(05):970-978.

[251] 张萃, 赵伟. 对外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09):89—96.

[252] 张炜, 景维民. 中国制度因素对 FDI 的影响分析[J]. 经济问题, 2012(09):36-41.

[253] 周海波, 胡汉辉, 谢呈阳等. 地区资源错配与交通基础设施: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01):100—113.

[254] 仲伟周, 陈晨. 制度变迁、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长方式[J]. 财贸研究 2018(01):27-39.

[255] 张二震, 戴翔. 高质量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提升[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5):1-10.

- [256] 张彩云, 李计广. 开放如何促进改革[J]. 中国外汇, 2018(09):16-17.
- [257] 邹静娴, 张斌. 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对外开放——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经济评论, 2018(02):9-23+4.
- [258] 张二震, 戴翔. 高质量利用我自与产业竞争力提升[J]. 南开学报, 2018(05):01-10.
- [259] 钟昌标. 《外商投资法》与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型[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9):139-147.
- [260] 张明. 如何系统全面地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8(04):1-8+2.
- [261] 周建军. 从防风险到补短板: 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与应对[J]. 学习与探索. 2020(07):
- [262] 周天勇. 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06):14-17.
- [263] 张明. 准确理解“双循环”, 推动新一轮区域一体化发展[N]. 四川日报, 2020.
- [264] 张清华, 郭淑芬, 黄志建. 城市规模提升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 2020(18):69-72.
- [265] 周天勇. 中国潜在增长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06):2-17.
- [266] 张茉楠. 打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须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J]. 经济要参, 2021(1).